



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，是由一系列特殊时刻构成的宏篇巨制。前进与曲折，光荣与梦想，几度大悲大喜，多少是非曲折，构成一曲撼人肺腑的千古绝唱。

直面历史，直面菁英，史家胆识，选家眼光，再现

共和国的悲壮与辉煌。

苍海横流 经天纬地英雄业
风云际会 壮曲悲歌志士情

团结出

DONG GUO ZHI QI LEI BEI CHUANG QING CHUN ZHONG GUO ZHI QI LEI

悲怆青春：中国知青泪

•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•

悲怆青春：中国知青泪

余夫 汪卫华 编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 号

责任编辑：何 平

版式设计：严 冰

悲怆青春：中国知青泪

余夫 汪卫华 编

团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北京市达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2·5 字数 320 千字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061—810—4/I · 166

定价：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编 潮涨潮落

北京知青历程回眸 (1)

- 竟敢吃贫下中农的鸡
- 红卫兵语录战
- 地下理论领袖们
- 鸟托邦试验
- 偷知青像偷日本鬼子
- 与上面直接对话

中国知青梦的幻灭 (22)

- 女知青难产而死引发超级骚乱
- 知青领袖成名前后
- 云南知青第一次大罢工
- 百名知青请愿代表集体卧轨 72 小时
- 知青运动走在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：回城？死亡？
- 千人大绝食
- 离婚·弃婴·待业：知青逃亡三部曲
- 1979 年，回城知青 760 万

下乡知青人生切片 (91)

- 一个美丽而又凄凉的故事
- 崎形的时代造就崎形的命运和性格
- 爱情在初恋时离开
- 一夜之间，中国轰轰烈烈地发疯了
- 生活依然空虚和百无聊赖
- 生命是一项不尽平衡的、没有规则的变幻莫测的运动

“文革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透视 (193)

- 始自 1955 年的远征垦荒队
- 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应急措施
- 改造青年、“反修防修”的政治运动
- 下乡知青共达 1623 万
- 伤害与磨难：二难情结
- 展望：继续？改革？

第二编 旧事新闻

婚链：一个女知青的爱情困惑 (207)

- 女友嫁给农民，她也便跟着嫁给农民
- 她是个不愿受约束的女人
- 怀孕时的溟蒙幻象，像刀割一样，总在她心里抹不掉
- 串联组织几十个北京知青赴京上访
- 就喜欢和别的男人们来往

中国知青在外国 (240)

- 在越南，中国苏联援越部队不收留他
- 在利马，恶运始终像魔鬼的阴影一样笼罩在她的头上
- 在缅甸，他在枪林弹雨中生活 3 年
- 在丹麦，一个女知青与丈夫、情人的感情纠葛
- 在墨西哥，他用自己的同胞赚取 25000 美元
- 在阿富汗，她在走私宝石时大开杀戒
- 在阿巴丹，他永远躺在异国的大海里
- 在卡拉奇，她用剃须刀切开了自己的腕动脉

第三编 风云人物

董加耕之路 (293)

- 乔石说，“好面熟！”
- 在农村几近 20 年
- “文革”中被关 3 年
- 副乡长致富有方

朱克家的沉浮 (303)

- 被姚文元看中
- 跟“四人帮”越靠越紧
- 25 岁住进省委书记的小洋房
- 学外语的姑娘闯进生活
- 煤矿二级工

柴春泽其人其事 (316)

- 造父亲反扬名全国

- 出访日本闹笑语
- 19个月监狱生活，使他变得神经兮兮
- 一个姑娘纯洁而神圣的爱
- 旧梦重温
- 招工回城·上大学·电大教师

四名女知青典型的今昔…………… (354)

- 党委副书记被分进托儿所
- 第二号知名人物的凄惨爱情
- “公开跳出来疯狂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”
- 风流人物不想再度出名

跨世纪的“桥梁”

——今日“老三届”实录…………… (376)

- “老三届”：一个特定时代、特定环境造就的具有一定社会特质的人群
- 上海“老三届”达100万人
- 今日“老三届”从事职业抽样调查为：职工41%，基层干部37%，科技人员和教师21%，其他1%
- 对过去，他们或彻底否定，或一番酸楚，或回避过去
- 顶替回城时，67%的人由组织安排工作
- 历史注定：“老三届”只能是奋斗、艰辛、奉献和开拓进取的一代

北京知青历程回眸

陈小雅

- 竟敢吃贫下中农的鸡
- 红卫兵语录战
- 地下理论领袖们
- 乌托邦试验
- 践知青像践日本鬼子
- 与上面直接对话

上篇

时间：60年代末期

地点：内蒙大地由宁夏往包头一线

场景：一列火车由西向东驶去

政治气氛：红色恐怖

人物：两个“扒车”回北京探亲的知识青年

他们中间的一个，叫李晓峰。20年后的今天，他已经40岁，是北京大学讲师，但讲起那段经历，仍免不了黯然伤神：

竟敢吃贫下中农的鸡

和我一起扒车的叫漫子。他和我在一个队。但我们之间有很

多争吵。他一心要和贫下中农结合，反感我们干部子弟扎堆，说这样给贫下中农印象很坏。他老嚷嚷着要和我们分家，干起活来也确实出大力流大汗。可我一开始就知道，我们分散了，老乡更欺负我们。我们的选择只有两条，要么是干几年走，要么是一辈子不走，安安心心生活、劳动，自然就跟老乡一样。老嚷嚷结合，实际上还是想走捷径，出人头地。

老乡看我们内部闹矛盾，迟迟不给盖房子，因为没法用这笔安家费。我们住在邪枝子家的一间破房里，很长时间一点建设都不可能有。因为穷，老乡什么都偷。我们的境况困苦已极。有一次，我挖渠拉伤了背，躺在炕上几天不能动弹，房顶漏雨，我在床上无处可躲。天稍一晴，邪枝子家的鸡呀、猪呀就拱进门来，满屋乱叫。有一只鸡飞到床上，在我脑袋上踩，我气极了，心想，人病了，连鸡也来欺，于是一巴掌糊过去。听到那鸡惨叫一声，我的心“噔”的一下，凉了。我怎么啦？把贫下中农的鸡打死了。这时候，我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沮丧。

志敏收工回来了，他是我们那儿一个特别老实的知青，平时不苟言笑。他看见这种情况，一声不吭，蹲在地上就吱儿吱儿拔起那死鸡的毛来。我一看，急了，“你怎么？这是贫下中农的鸡。”他也不搭话，只顾开膛破肚，升火烧水。满屋子都是烟，因为我们说了好久，也没人来给我们修烟道。

漫子回家的时候，鸡已经煮熟了。他一进门，“嗯，好香啊！”也不问，打开锅盖，拎起来就啃。吃了几口才想起来问一句“哪儿来的？”志敏不吱声。我说邪枝子家的，漫子大惊失色，手里的鸡都掉了。接着真的动了气，质问：“你们怎么能吃贫下中农的鸡？”

志敏也来了火，说：“吃只鸡？算便宜了他们！他们偷咱们多少东西？连工具都偷。”漫子不吱声了，过了老半天，挺难过的，看着锅说：“我不能吃鸡。我就喝点汤吧！”

后来我养了一只大狗，凶猛无比，谁都不认，极可怕。老乡

的偷风才收敛点儿。其实邪枝子家还算那儿最好的。所以，我们下去的第一件事，其实是生存，是在那儿扎下来。

至于漫子，和我关系还是最好的。有一次，小海（就是那个在文革中写《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》的骆小海）做饭，不小心把锅炸了，温子还骂他“败家子”什么的，对小海那种骑着毛驴在田头乱窜的劲头极看不惯。他想争取我，打掉干部子弟味儿。当然，这种观点也没有坚持多久，他就和我们同样了。

扒车的故事

我们扒车，是因为我们没有钱。在队上干活儿的收入不够糊口，我爸爸被“专政”后，每月只发给我们全家十几块钱。第一年插队时根本就回不去。后来用中学时候学校里开给学生买半票的证明（加刻伪造的公章）混过。大部分时候只能扒车。

那时候知青扒车出事的很多。有的人扒闷罐车，有冻死在里头的；有的人怕冷，在里面生火，有烧死在里头的；不过，我们扒的是客车。

怎么扒法呢？首先是要混上车。我们从临河站，各买了一张到乌拉特前旗的票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到附近有一次查票。上车后，因为心虚，我们都鬼鬼祟祟地缩在角落里。还好，晚上有座儿。我坐的地方和漫子不挨着，为了缩小目标，我下乡的时候，带了许多书去，然后每次回家时带一点回去。这一次，我装了一书包，让漫子给背着。我自己书包里有一、两本。晚上也没法睡，于是，我就掏出一本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美学》看。

那时候，我们走的这段铁路已经被驻张家口的野战军给管制了。列车员全是军人，没有几个工人。他们管了这条线后，经常被登报。因为他们把列车办成了“毛泽东思想大学校”。但是可怕也就可怕在这里。

我正看着书，没注意到一个解放军从身边走过。他走过去又返了回来。他在我背后看了看，看我正看得入神呢，冷不防叫了

一声“看什么呢？”把书抢了过去。我一下就急了：“你怎么随便拿我的书啊？我，我还要呢！”他很奇怪的说：“你还要这书？你看的什么东西？”我说：“《美学》啊！”

“美学？！”他突然提高了嗓门，对车厢里昏睡的人们喊道：“听着听着，他还看《美学》呢！《美学》！”他大概认为，美学就是讲美女，也就是讲女人的。我对他解释，《美学》不是讲这个的。他说：“你不要说这个，你不要说这个。啊！周扬，看大黑帮的书！”我说不是周扬写的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受过列宁称赞的。他装作没听见，只对着车厢里喊：“啊！周扬翻译的！周扬翻译的！”哗——，车厢里的群众顿起一片吼声。

我之所以特别着急，主要是特别想保住那本书。我特别心痛，因为好不容易才弄到它的。那阵儿我正好在钻研美学，搜集了一套，单缺这一本，特别可惜！后来我看引起公愤，而且已经开始有人检举漫子了：“还有他，也是和他一起上车的。”有人甚至说要搜查漫子，说“你看，还有一书包呢！”我心里直发毛，急中生智，赶紧向那个解放军说“哎呀！我错了！我错了！我犯了严重错误。”那解放军看见我态度有悔改，就让我跟他走了。

离开了怒吼的车厢，他把我带到了餐车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刚才教育你，你还挺横（hèng 凶蛮、傲慢的意思）！其实，我完全是为了保护你。你要再继续争下去，革命群众起来了，可就不得了啦！我们这儿，这种事见多了。”原来，这辆车早已办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，除了吃饭、睡觉的时候，整天就是办统一的学习班。常在这条线上跑的旅客，都很自觉。有一次，一个人早请示的时候不站起来，当即就被押下车，在站上劳改，扛大麻包。什么时候改造好，什么时候上路。这个解放军对我说：“你要是再闹，也是这个下场。我看你年纪轻，保护你。现在，你好好交待：你哪个学校的，家里干什么的，到这儿干嘛来了？”

我父亲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，山西党的创始人之一，可眼下是黑帮，这告诉他还得？我当时又不怎么会撒谎，必须经过

一番考虑，用比较软的方式才行。象打牌似的，互相诈，我不行。我开始顺着那个缓和下来的势，用一种半真半假的态度编瞎话。我说我家是干部，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，我思想也想不太通。不过，我父亲最近刚刚被结合。他听了立刻说：“你看，你父亲还挺不错的嘛。你看你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”我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。我不想告诉他我是在这儿插队的，于是讲，我们学校正在组织插队，我先来看看，想挑一个比较好的地方。我知道他接着便要查我的票了，而我只买了一站的票。我就顺着说，我们还有分到前旗的。……

说话间，我已经感到列车哐啷一声停了，乌拉特前旗已经到了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看我的票，一下把我放到前旗就糟了。我于是有意将话的速度放慢，想拖到开车。

说着说着，车又晃动了，我突然意识到出现了一个良机，我就说，我还想到前旗去看看同学。我给他看了我的票，一边装傻说，不知道前旗还有多远？

他说：“什么？前旗已经过去了，你怎么不说呀！”想了一想，他又拿腔作势地说：“你还想到前旗去？你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。你的问题必须到北京解决，我们到北京还要调查的。”接着他又问我为什么看周扬译的书，周扬那么反动。我脑子一转说，最近姚文元同志有一篇批周扬的文章，我们也要批，所以找一点反面材料。他立刻又火了：“批周扬？！姚文元同志是什么水平？你？你是什么水平？你中毒都中不够呢！”最后，他指着餐车上全给砸碎的玻璃说，这一路老有阶级斗争新动向，宁夏十三师（知青兵团）有时和解放军还接上火了，逮了一些，其余的全跑了。说起宁夏十三师，人人都有点谈虎色变。

为了保证“安全押运”，我和漫子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去了。

漫子的情绪坏到极点。在危难的时候，他总是出现这种状态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被捏进局子里去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。

那一次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1968年到临河的这批人，原本

不是学校组织的。我是投奔木生去的。他 1965 年就下去了。我们是初中时的哥儿们，在学校和人打架，不好好念书。我们之所以要上山下乡，完全是因为看不惯学校那套制度。我是品行不好，成绩好。其实也不是我要打架，是别人老爱招我打架。而木生是双料货。他走了以后，我特别想念他。1966 年“8. 18”的时候，上百万的红卫兵和各界代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，等待毛主席接见，我却从北京到内蒙，下了火车后徒步 90 里去找木生。那一次，我尝到了享有盛名的河套西瓜，好吃极了。……

所以，轮到我们插队的时候，我就想找一帮人，水泊梁山似的找个地方呆着，搞成象美国的那些公社一样，五星聚会，煞是威风。为了去木生他们那儿，当时还和学校吵翻，形式都是破口大骂。我当时找了小海。他是清华附中红卫兵，最早起来造反的。1966 年 6 月就贴出了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》的大字报，后来被中央文革利用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了。接着还有二论、三论。毛主席的“造反有理”的信就是写给他们的。但是到了 1968 年，小海的日子很难了，差不多都到了要改名换姓、恨不得流窜到一个地方躲起来的地步。我找到了他。他当时为了带女朋友，还劝我找一些女生一块儿去，说要比例适当。我不明白其中奥妙，真的去找，还引起一些人的误会。

那一次，我找了 30 多人，聚在一个房子里开会。开着开着，就进来了一串警察，把我们一无遗漏地全捏进了局子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我们开会的地方对门是个中学，旁边就是派出所。中学的门房看见对面的房子突然来了许多人，自行车亮晃晃地排了一大片，以为在搞什么非法活动，所以就报了局子。那时候的人，阶级斗争和警惕性是极高的。

那一次，漫子就特别恼火。他认为我们这里好多人尽给他捅漏子，自己总是被连累。也是为了给漫子宽心，我说，这下子我们有了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到北京了。问题是，只要我们能在快到北京时的哪一站逃脱就行了。我盘算着，觉得最

理想的是清华园车站。那时候，那儿只是一片荒郊，我们学校在那儿劳动过，我熟悉地形，而且离家很近……

离那块我们熟悉的土地越来越近了。我记起我父亲下干校的时候的情景。按我姐姐的话说，我父亲有过很多很难过事儿，而我一直对他敬而远之。我们一说话就会呛起来。我父亲要走的时候，他大概觉得是件挺大的事，告诉我们这个，告诉我们那个，好象生离死别似的。而我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当他出门的时候，我好象觉得他是出去散步似的，连站都没有站起来。他突然在门口骂了一句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！”我好象觉得心里一阵难受，于是跟了出去。我和父亲走到中关村车站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一直戒不了这烟，一直戒不了这烟……抽烟可是个坏东西。小弟，你以后可千万别抽烟。”说完就一扬手，咚地一声把烟斗扔到田里去了。那时候，中关村还是一片田园。

从清华园到中关村，太近了！一想到这儿，我不禁有几分得意。

可是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清华园车站过去了。不停！我们没有料到这一步。下面紧接着便是西直门站，如果这一站逃不掉，那么，到北京站就插翅难飞了。那结局便是送学校，找父亲单位，说话全会被戳穿……

车停在了西直门站。我和漫子瞅准了那个解放军提桶打水的机会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硬是挤进了人群。

我从出站口硬挤了出去。漫子却被抓住了

漫子啊！漫子！

漫子是我们中间和贫下中农结合得最好的。贫下中农还要给他介绍对象呢！介绍给他的是“十八铁姑娘”中的一个，内蒙古本地人。当然，漫子不干。

漫子现在自称是中国最大的官商，先是搞石油进出口贸易，现在又搞什么新技术开发。他现在在世界上飞来飞去，住的是总统套间。这次见面，他还直向我们这些寒酸的教书匠夸耀呢！

中 篇

时间：1969年

地点：北京，我国某著名地质学家公寓

场景：烟雾弥漫，有人高声讲演，有人飞快地记录。某人的
沙发下面，一台老式笨重的录音机在转动

人物：原红卫兵和知青中的各路豪杰。

除了李晓峰，他们当中还有张木生。张木生现为《中国农村百业信息报》社社长，是我国最近这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。然而，当初事发的时候，情景却少有浪漫的色彩。

红卫兵语录战

李晓峰：

那天，咱们在黄以平家里聚会。记不得是谁邀的了。他家的房子很大。我和一些人坐在这个墙角里，另一些人坐在那边的墙角里。我们有些是老朋友，不过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了。还有一些刚认识。反正有许多共同话题，瞎聊呗！但是气氛很热烈。坐在另一角的人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也不认识。但是我没想到那里面有一个人内心很不平静。他叫任公伟，是北京中学红卫兵“四·三”派里的一个头儿。

“四·三”派主要是以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子弟组成，是反对“血统论”的。它因1967年4月3日的某事件形成，因此得名。与它对立的是因4月4日的某一事件形成的“四·四”派，主要由老红卫兵组成，以一些先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弟为主，倾向于“血统论”的观点。这是当时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两个主要派别。但是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，在很多情况下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比如说，我不属于任何一派，但我是反对谭力夫的《血统论》的。那时候，我们到清华和卜大华、熊钢他们辩论“对联”（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——基本如此”）的事，他们就认为我们是“四·三”派。那一次，木生这小子，把卜大华轰下台去了。他讲话特别具有煽动性，就跟他妈的希特勒一样。可是最开始他看见谭力夫的讲话时，还认为挺棒的。回去问我，我说不好。后来木生就写了个东西，到各个大学去散发，散到清华的时候，清华就说要组织一个辩论会。我们去了，木生主讲，我和小农（陈伯达的儿子）在后面蹲着。他们在前台大喊大叫。木生没词儿的时候，就来问计，我们就给他出主意，打语录仗。这方面我们根底厚，看的书比较多，而且马恩列斯毛、《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包括一些内部讲话，都烂熟于胸。有一次，木生好象被熊钢抓住了把柄，是关于什么匈牙利事件的。熊钢蹭地一下窜到台上，不依不饶。木生心里没底，于是又往后台跑。问过我们以后，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台前：“我告诉你们吧！说我刚才那句话讲得不对，是不是？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。”熊钢下不了台，就说：“嗯，这个话好象是过去说的，恐怕过时了。”木生抓住战机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抢过话筒，高呼到：“永远是毛泽东时代——！”哗，下面于是欢声雷动，我们于是大获全胜。

所以，许多人认为我们是“四·三”派的。但是，在遇罗克的《出身论》出来之前我也写过一个东西。既不赞同《血统论》，也不赞成后来那种《出身论》。“四·四”派的人就觉得很好。那时，这是中学生中最热门的话题，动辄要谈这个，所以象“四·四”派的头儿李冬民他们办的报纸上，好多文章里的话都是我讲的。当时《解放军报》社的一个头儿，也觉得我讲得特别好。我觉得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，他那文章的风格和我们就不一样，完全象港台的那种风格。那时，大家觉得和他是不一样的，他是在泄私愤。所以，观点不论怎么接近，也要先声明：和遇罗克是不一样的。立场不一样。所以说，那种历史局限性是很难超脱的。我

的文章？无非是面面俱到，貌似公允罢了。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讲的“有成份，但是不唯成份。重在政治表现”。我说谭力夫是只要头，不要中间和尾；而遇罗克是不要头和中间，只要尾，不全面。

其实我同情“四·三”派。因为当时有些事在我脑子里是想不通的。我有个同学的姐姐，成绩什么的都特别好，可是就是上不了大学。因为他家里有什么人在“镇反”当中被专了政。而象王××的儿子什么的，调皮捣蛋，却保送哈军工。我这个同学很难过，我当然也跟着挺难过的。陈小农也讲过，他们班也有这种情况。当然，小农是准备接班的。我们党 1964 年就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。他高中入党，准备保送高级党校的。后来，他也是真心诚意下农村，到广阔天地去锻炼的。

但是，有一批人是真正具有干部子弟色彩的。他们也学各种各样的知识，但就在是在知识结构根本改变以后，他们也不会忘记，他们最终是要到政治舞台上管事儿的。他们绝对不会去从事某种学问的研究。后来他们果真也成了各方面比较活跃的人物。

圈子里的告密者

我认为，下乡以后，红卫兵时期的话题早就换过了。1969 年的下半年，秋收过了的知青都纷纷回到北京。这时候，我觉得知青中出现了一种特别奇怪的气氛，什么弹钢琴呀，写诗呀，谈恋爱呀，读小说呀，出现了好多小圈子，大家好象都在附庸风雅。最近看到北岛在法国答记者问时回忆说，他当时为什么写诗，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。现在很多人把郭路生给忘了，他因为爱情不幸，得了精神病，嘴巴歪斜。他当时的诗为什么写得那么漂亮？也是因为爱情。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莎莎（赛福鼎的女儿）的。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。我那时看到郭路生，对他印象特别好。他为人谦虚，也很大方。每当聚会的时候，大家说，你他妈诗写得不错，给你们来一首。他一点也不忸怩，说：“好！我就给你们朗